

中苏建交的幕后“传言人”

1949年开国大典后仅几十个小时，苏联和中国先后宣布与对方建交。其中，一位名叫谢尔盖·列昂尼多维奇·季赫文斯基的苏联外交官不仅在10月1日当天登上天安门城楼，观摩开国大典，还有幸成为中苏两国建交的幕后“传言人”和“见证者”，并在此后几十年时间内为中苏、中俄友好关系作出许多贡献。不久前，季赫文斯基生前回忆录《重返天安门》问世，回顾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细枝末节。



谢尔盖·列昂尼多维奇·季赫文斯基

A 周恩来向他发出急信

开国大典进行时，贵宾云集的天安门城楼上，外国人只占极少数，真正的外国官方代表仅有一位，那就是季赫文斯基。微妙的是，他名义上还是苏联派驻中华民国政府的北平总领事而已，因为当时中苏双方并未正式建交。就在庆典结束后数小时，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

部长周恩来派助手来到苏联总领馆，给季赫文斯基送来一封急信，内容是要求苏联承认新中国并与其建交。

在回忆录里，季赫文斯基详述了这一重大历史细节：“我迅速将其译成俄文，然后与译电员一起将电报发给莫斯科。第二天早晨，值班的管理主任告诉

我：‘我刚才收听莫斯科的广播，清清楚楚听到您的名字！’原来，因为时差的原因，我拍发的电报恰好送到斯大林的办公桌上，他当即下令在中央媒体上进行公布。就这样，苏联于10月2日正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。”

B 苏联使团的“全新的命运”

很快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正式与苏联建交。当时，就驻华大使人选问题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，苏联政府决定选择在中国待了6年多并一直和国民党打交道的外交官罗申。

罗申先后担任苏联驻国民政府大使馆的武官助理、苏联驻华特命全权大使。1949年1月，国民党预感南京不保，极力动员各国驻华使馆随同政府一起搬迁广州，罗申奉命率馆员随国民党南迁，后来才只身回到莫斯科。

身为当事人，季赫文斯基也没想到斯大林会提名罗申“回炉”，带着满脑子的疑惑，他立即拜见周恩来，就新驻华

大使人选征询中方的意见。几十年后，季赫文斯基清晰地记得：“周恩来让我在他的办公室里稍等一会，他本人去了不远处的毛泽东办公室。过了15分钟，他回来告诉我说，中国政府同意苏联提出的大使人选。”

就这样，罗申从苏联驻国民党政府的最后一任大使变成驻新中国的首任大使。季赫文斯基马上向国内汇报。10月4日罗申从莫斯科启程，于10日下午4时18分抵达北京前门车站。此时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等候多时。按照国际惯例，大使到达一般由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出面迎接即可。罗申

由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个隆重接待的外国大使。

新的中苏关系也给苏联驻华外交使团带来“全新的命运”。10月20日，被滞留在广州的原苏联驻国统区外交人员终于来到北京，加入罗申领导的苏联大使馆。

在新中国成立头两个月里，苏联就派出援华专家300多名，几个月后就增至数千名，季赫文斯基在回忆录中强调：新的苏中关系完美地拉开帷幕，那是一种真诚的、令人振奋的、世代皆兄弟的友谊。

C 真诚的友华派

在中国现代外交史上，季赫文斯基的地位不容小觑。1939年，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来莫斯科访问，见到了苏联高级领导人，全部会谈的翻译正是季赫文斯基。卫国战争爆发后，季赫文斯基承担了繁重的外事任务，于1943年经新疆来到重庆，当上苏联驻国民政府大使馆二秘。

1946至1949年，季赫文斯基任苏联在华北的外交代表，负责苏联驻北平总

领事馆事务。1949至1950年，季赫文斯基担任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；1968至1974年，他曾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委会苏联委员。

季赫文斯基不仅知华，而且是真诚的友华派。1949年底，毛主席首次出访莫斯科，还参加斯大林70岁生日庆祝，季赫文斯基亲自陪同毛主席抵达中苏边境。

在92岁高龄时，季赫文斯基感慨

道：“我觉得中国领导人做得非常明智，他们坚持基本制度，但同时调动了个人积极性。中国人一边总结经验，一边前进。我认为，这个体制非常灵活。”

中国也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。1999年10月1日，季赫文斯基再次受邀来华参加国庆大典。2018年2月24日，季赫文斯基在莫斯科辞世，享年百岁。

吴健

大揭秘

名将朱可夫曾来中国做军事顾问

1937年7月“卢沟桥”事变爆发，战火在中国迅速蔓延开来。随着中日全面战争的开始，中苏谈判才算理清了头绪。1937年8月21日，双方在南京正式签署《中苏互不侵犯条约》。当时，苏联虽然拒绝了蒋介石要求其迅速对日开战的要求，却也很清楚问题的实质：中国一旦败亡于日本，将对苏联构成莫大威胁，援华势在必行。

为此，苏联开始向国民政府提供武器援助。苏援物资包括近千架飞机、近1200门火炮、大量的枪械、弹药和油料。依靠82辆苏制T-26型坦克以及大量车辆武器，还组建了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兵团——200师。国府高官孙科后来在1944年评价道：“外援方面，自一九三七年七七以后，直至一九四一年六月苏德战争以前，整整四年间，我们作战所需的物资，大部分依赖苏联的援助。”

1937年至1939年2月中旬，苏方还向中国派遣了3665名军事人员（空军人员712人），截至1942年则达到5000人。其中战死186人，失踪9人（基本都是在空战中损失的）。

在苏联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中，包括朱可夫和崔可夫等未来苏德战争的名将。对于苏联军事顾问起到的作用，向来说法不一。只有一点可以肯定：他们不会指手画脚胡乱干预，比后来的美国人更受蒋介石欢迎。斯大林甚至不时地给中国官员打气。

邓稼先：“一个太阳不够用”

1958年邓稼先秘密地参加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。当苏联单方撕毁两国政府签订的援助协定和合同，撤走专家后，面对留下的残缺不全的核爆大气压数字，为了研制出我国的“争气弹”，时任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的邓稼先和二机部的科研班子带头攻关。

由于条件艰苦，同志们只能使用算盘和4台老式的上海通用牌手摇计算机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，为了演算一个数据，一日三班倒。算一次要一个多月，算9次，要花费一年多时间，常常是工作到天亮。作为理论部负责人，邓稼先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。每当过度疲劳，思维中断时，他都着急地说：“唉，一个太阳不够用呀！”

就这样，他领导二机部科研人员用算盘和4台老式手摇计算机，日夜加班，对原子弹爆炸时的物理过程进行了“九次”模拟计算和分析，最终推翻了苏联专家撤走时留下的结论，到1962年终于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，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的关键性难题，迈出了独立研制核武器的第一步。

何家玲